



后 记

从 2000 年确定博士论文题目，到论文完成通过答辩，再到今天将修改后的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历经五年，我深知，在这个“只争朝夕”的时代，在职攻读期间的工作任务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原谅自己延宕五年的借口，更不敢用史学研究“板凳一坐十年冷”来标榜，迁延至今，实在有愧于师。

2000 年确定研究题目后，笔者先后在广东省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海关档案，期间一些个案成果发表于国内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论文集，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整个过程中得到导师梁碧莹教授的悉心指导。算起来，从硕士研究生跟随梁碧莹教授学习开始，在梁老师门下进行中美关系史研究已近十年，是她将我引入中美关系史研究这一领域，她的谆谆教诲使我从史学研究的门外汉发展到今天能够在她的指导下完成本书的写作。最难忘怀的是，1999 年初，梁老师看过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后对我进行的指导，不但就文章本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对我今后的研究道路乃至人生发展方向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那一次指导，将使我受益终身。不仅如此，梁老师兢兢业业、为学术奉献的治学风范也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向前，她坚持不懈的潜心研究这几年终于厚积薄发，学生由衷地敬佩。使我吃惊的是，博士论文初稿经梁老师和林家豪教授审阅后，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两位老师的红笔批注，从内容取舍到结构调



整,从视角切入到方法更新,再到学术规范和技术错误的纠正,甚至注释出处的核对,无不一一指明。看着这份批阅后的初稿,我立刻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有什么理由不将这份初稿永远珍藏呢?

中山大学历史系根基深厚、严谨务实、宽松包容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氛围为年轻教师提供了良好的治学环境,在资深教授学者学术风范的耳濡目染和耳提面命下成长,使我受益无穷。这里,我要感谢蔡鸿生教授和林悟殊教授在博士论文开题、结题和写作过程中对我的指导,感谢黄启臣教授在资料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感谢林家驹教授、邱捷教授、章文钦教授和吴义雄教授耐心解答我的问题,感谢历史系领导刘志伟教授、吴义雄教授、朱卫斌副教授、陈树良副教授、龙波副教授给我工作上的支持和徐泽洪、赖雪枫老师给我的帮助。本书写作期间,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恰好进行了新老交替,感谢他们的尽职工作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

同时,我要特别感谢厦门大学海关史研究中心的各位学者。陈诗启教授在病榻上听取我汇报研究状况,并慷慨让我复印司马富赠送给陈先生的《马士传》。感谢戴一峰教授、连心豪教授给我的宝贵建议,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先生在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感谢上海海关詹庆华先生在多次交流中给我的有益启发。同时,我要感谢广州海关学会廖冬梅会长和资深研究者吕健行先生在资料 and 思想方面的帮助和启发,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孙修福先生的帮助和包容。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博士论文评议和答辩过程中提出宝贵建议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陶文钊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余志森教授,暨南大学芦苇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林中泽教授和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感谢我的同学林丽雄、张文苑在各个方面给我的帮助,感谢台湾